

## 改革开放初期旅游创汇析论

刘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外汇。旅游事业作为创收外汇的手段之一,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1978年至1984年,国家通过拨款、引进外资、挖潜改造等方式增建旅游基础设施;通过调整游览内容、合理制定旅游价格、开发销售旅游纪念品等方式提高了旅游经济效益。这些措施既为国家吸收了为数可观的外汇,也为旅游业本身的全方位发展、为后来更大规模的旅游创汇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改革开放;旅游事业;外汇

**作者简介:**刘洁,女,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改革开放史、中国现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4)03-0088-12 **收稿日期:**2024-01-23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4.03.018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定。在此前后,党中央就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成了若干共识,包括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思想。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需要大量外汇,时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家财政紧张、外汇严重不足。“想一切办法搞外汇”<sup>①</sup>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旅游事业作为创收外汇的手段之一,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此前,国家层面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注意到旅游业的经济创汇价值<sup>②</sup>,但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未实施。70年代初,随着国家外交局面的打开,来华访问和旅行的西方人士逐渐增多。此时,周恩来明确指出,旅游工作方针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旅游事业的收支应该略有盈余”。<sup>③</sup>可见,这时旅游业仍主要作为民间外交的形式而存在。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国家对旅游业的定位从民间外交转向经济事业。以此,1978年也被学界视为中国现代旅游的“元年”。<sup>④</sup>那么,中国旅游业当时采取了哪些创汇手段,实际创汇成效又是如何,这是本文要考察的问题。

目前学界关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旅游事业已有初步研究,其中有的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红色旅游或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旅游事业的指导。<sup>⑤</sup>有的则是基于旅游业本身所做的“行业史”研究,而非历史学的考察。<sup>⑥</sup>

①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9页。

② 例如,1964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外事小组关于开展我国旅游事业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旅游事业的方针任务除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外,还包括为国家“吸收一笔相当可观的自由外汇”。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4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③ 《中国旅游大事记》编辑部编:《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6页。

④ 孙九霞等:《“旅游中国”:四十年旅游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

⑤ 主要研究成果有:贾楠:《改革开放以来红色旅游发展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贾楠:《陈云与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党史文汇》2022年第8期。

⑥ 主要研究成果有:郭旭红:《中国旅游业发展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石培华、翟燕霞:《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旅游业:演进历程、伟大成就及经验模式——基于WSR系统方法论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孙九霞等:《“旅游中国”:四十年旅游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

把旅游事业置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脉络中,从旅游创汇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的角度来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这是本研究的着力点。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探讨的“旅游”因围绕创汇而展开,故专指境外游客入境游。此外,本文将研究时段设定为1978年至1984年,是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国家领导层在这一时期多次提到旅游创汇,对这一问题极为关切;其二,为保障创汇,国家在此时段“暂不支持”国内旅游,形成入境旅游单一发展的局面,“旅游创汇”问题在此期间集中凸显。直到1984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旅游局《关于开创旅游工作新局面几个问题的报告》,要求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国内旅游<sup>①</sup>,国内旅游才开始发展起来。基于这些因素,本文在广泛运用档案、年谱、中英文报刊、日记、书信等多种史料的基础上,对1978—1984年间的旅游创汇问题进行研究。

## 一、旅游创汇的背景

1978年,全国上下迫切改变生产力落后的局面。2月底3月初,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重申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当时普遍认为,要加快经济建设,就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此前的1977年7月,中央政治局原则上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该报告要求在1978年至1985年期间引进总额65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随后,这一引进计划一再追加,至1978年7月扩大为总额550亿美元。<sup>②</sup>其中,仅1978年年内签约的对外引进项目就达78亿美元,涉及22个大型成套项目,而该年度中国外汇储备仅15.57亿美元。<sup>③</sup>显然,要完成引进任务,仅靠已有的外汇储备远远不够,必须向外借款。

1979年1月,陈云率先提出,该引进项目资金缺口过大,超过国家财力的承担可能,指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sup>④</sup>。3月,陈云与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央,指出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并提出用两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缩短基本经济战线规模。<sup>⑤</sup>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进一步谈到:“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但是,对外债要分析。”<sup>⑥</sup>这就是说经济建设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外资,但要谨慎。陈云的意见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赞同,22个成套引进项目大多缓建或停建,国民经济进入三年调整时期。

既然经济建设不能过于依赖外国贷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又需要大量外汇,如何“创汇”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旅游业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其创汇潜力引起中央的重视。1977年11月,邓小平在视察广州时对广东省委负责人说,有华侨提议搞好旅游业,“随便就能挣二三十亿外汇。用这些外汇进口大中型设备有什么不好?……从旅游角度可以解决广东许多问题”<sup>⑦</sup>。1978年1月3日,李先念在接见华侨旅游工作座谈会代表时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旅游工作要大发展。”<sup>⑧</sup>甚至外媒也看出来“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旅游业的巨大创汇潜力”<sup>⑨</sup>。

在诸多经济部门中,旅游业的创汇价值之所以引起中央重视,除了它“赚钱多,来得快,没有还不起外债的问题”<sup>⑩</sup>之外,还与国际上兴起的“旅华热”有关。70年代末,随着中美两国改善关系并于1979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1页。

② 刘荣刚:《对一九七八年二十二个成套设备项目引进的历史回顾》,《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③ 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1页。

⑤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4),第1569页。

⑥ 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⑧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5卷,第553页。

⑨ James P. Sterba. “China’s crash hotel program.” *New York Times*. Feb 07, 1979.

⑩ 邓小平:《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见国家旅游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旅游(一九七八—二〇〇四年)》,中国旅游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年正式建交,与西方隔膜了三十多年的中国一时间吸引了大量西方人士。这些人对中国充满好奇,想看看新中国的面貌,同时游览中国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如同《纽约时报》1979年2月报道的那样,“突然之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旅行地”,25000名美国游客即将到访中国,“如果中国方面在入境上不设限制,将有10倍于此的美国人群趋中国”。<sup>①</sup>可见中国旅游业的国际消费群体相当可观。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侨胞也思乡心切,纷纷在此时回国探望亲友。仅1978年全国就吸引了180.9万入境游客,其中外国游客23万,侨胞157.9万。<sup>②</sup>

另外,70年代末韩国、印度、新加坡、泰国等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国提供了借鉴。当时,旅游外汇成了这些国家的重要外汇来源。<sup>③</sup>这些信息极有可能被中国领导层注意并借鉴。例如,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就给与会者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参考材料。<sup>④</sup>此外,《参考消息》也经常译介各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

这样,在中国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外汇、中美建交及国际社会兴起“旅华热”、亚洲多国通过旅游得到外汇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政府决定大力发展旅游业。1978年1月31日,李先念出席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时说:“旅游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是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争取外汇的一个途径。各级党委要重视加强旅游工作。”<sup>⑤</sup>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领导人首次从经济价值的角度公开肯定旅游业。这次会后,国务院决定3年内拨款3.6亿元用于建造旅游饭店,添置交通车辆等设施,并将原由外交部代管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改为直属国务院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旅游局”),<sup>⑥</sup>标志着中国的旅游创汇从设想走向行动。

## 二、改善旅游住宿及卫生设施

旅游创汇战略既经明确,下一步即如何创汇。在如何创汇的问题上,首要难题是旅游基础设施不足。当时海外游客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1978年为180余万人,1979年为420余万人,1980年为570余万人<sup>⑦</sup>,以后仍持续增加。如此庞大的游客群体远远超出中国当时的接待能力,旅游饭店不足、景区缺乏现代化卫生设施等问题,成为旅游创汇实践初期面临的难题。

1978年,全国共有涉外饭店137座,客房1.55万间,床位3.07万多张。其中,北京的住宿问题最为突出,这是因为游客来华必到北京,而1978年北京仅有涉外饭店7座,即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饭店,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前门饭店、友谊宾馆、新侨饭店、民族饭店、西苑大旅社、华侨大厦。这7座饭店可能接待外宾的床位计有5200张,实际用做接待旅游外宾的床位数还不到1000张。<sup>⑧</sup>假设华侨能够投宿于亲友家中,以北京当时的床位数量,即使全部用来接待外国游客也远远不够。

面对突然到来的大批游客,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首先是依据接待能力控制签证数量,这就导致有意来华的游客必须提前一到两年进行预订。早在1979年2月,美国各旅游公司推出的中国行就已销售一空,此时如想赴华,只能预订1980年或1981年的行程。<sup>⑨</sup>其次,为了让已抵达中国的游客尽快入住,1978年上半年,由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牵头成立包括国家旅游局、对外贸易部、北京市财贸办公室、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科学院等10个单位代表组成的北京外宾用房统筹安

① Paul Grimes. "China, 1979: The ways and means." *New York Times*. Feb 04, 1979.

②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38页。

③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去年经济取得进展》,《参考消息》1979年5月4日。

④ 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282页。

⑤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5卷,第561页。

⑥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38页。

⑦ 《中国旅游大事记》编辑部编:《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第201页。

⑧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291—292页。

⑨ Paul Grimes. "China, 1979: The ways and means." *New York Times*. Feb 04, 1979.

排小组,负责协调解决各系统游客的用房矛盾。<sup>①</sup>最后,在实在找不出房间的情况下,将游客连夜拉到天津、北戴河等地入住,翌日再运回北京游览,给游客带来不良体验。一队日本游客兴冲冲到达首都机场,就发生了以下一幕:

到机场迎接游客的工作人员用流利的日语说:“你们住宿的饭店还没有确定,先带着行李游览市容吧。”我们被领着转了一天,心想这回总可以在饭店里吃晚饭了吧,可是导游的人又说:“这里没有你们住宿的饭店。请大家现在乘夜班火车去天津。天津离北京才一百多公里。”<sup>②</sup>

在数座大型饭店于1982年竣工开业以前,这是来华旅游常见的现象。

除数量少外,饭店质量也难以达到现代舒适标准。以北京市最高档的北京饭店为例,1982年11月,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入住该饭店,时饭店尚未完成装修改造,沃霍尔当天日记记到:房间里“蟑螂成群出没”,当晚“和衣而睡”。<sup>③</sup>又如,著名历史学者何炳棣1980年准备来华参加南开大学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史学界召开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行前他再三向南开大学副校长郑天挺确认住宿问题,言“吃的问题不太大。会后旅游问题也不太大”,仅“非常需要知道对会期住宿问题的详细安排”。何炳棣在信中流露出对住宿条件的担忧:

南开是否自己已建有招待所,是否每间房子内部都有卫生洗澡设备?您信中所说,留学生宿舍究竟设备怎样?这一些问题我很多都不好意思明问。但再四考虑之后,为八月间避免可能的误会起见,我必须事前强调一点:被邀请学人类多已是成名教授,或中年或不久即将退休,无论美国人或是华裔,多年已不习惯“高级”学生式的生活。天津八月初极热,每人非单人房间不可,亦必需有洗澡卫生设备,最好还能有空调。<sup>④</sup>

为解决饭店的数量和质量问题,1978年3月,国务院决定拨款3.6亿元用于增加旅游设施,主要就是新建和扩建旅游饭店。例如,北京饭店进行了几次大规模装修改造。1982年,改造始建于1917年的北京饭店中楼,使其由最老旧的客房变成设施最新的客房。1984年,改造始建于1954年的西楼。加上建于1973年的东楼本就较新,改建后的北京饭店重新成为首都一流的现代化饭店。<sup>⑤</sup>除北京饭店之外,北京地区改建扩建的老饭店还有西苑饭店、民族饭店等,此外,还新建了香山饭店等一系列高级饭店。<sup>⑥</sup>在北京的带头示范下,各地方政府也拨款兴建了一批饭店,共计120家左右。<sup>⑦</sup>

这些饭店从动工到竣工营业需要数年时间,游客却在源源不断地到来。因此,在加紧修建新饭店的同时,中央也决定对旧招待所进行“挖潜”,以之接待游客。1979年,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做出了相关指示。当年1月,邓小平提出将北戴河休养所用来接待外国游客。同年9月16日,李先念对国家旅游局负责人说,解决旅游住房问题,“要把挖潜放在第一位,挖潜现实得很,来得快”<sup>⑧</sup>,各地要把招待所统一拿出来,对外开放。随后,国务院批准将毛主席纪念堂所属的向阳一所、二所(共1400多个床位)让给旅游部门使用,但所有权仍归原单位。<sup>⑨</sup>同年12月,邓小平表示,钓鱼台国宾馆应该拿出几栋用于旅游。<sup>⑩</sup>在中央领导的多次提倡下,河北、山东、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四川、辽宁、广东、陕西等省也把当地政府的一些招待所腾出来接待游客。<sup>⑪</sup>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292页。

② 《日本经济新闻》通讯(中国:“通过旅游建国”》,《参考消息》1980年2月5日。

③ 安迪·沃霍尔著,帕特·哈克特编:《安迪·沃霍尔日记》,金晓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44页。

④ 郑克晟:《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中华书局,2023年版,第211-212页。

⑤ 程清祥:《北京饭店的改革和经济效益》,《旅游论坛》1986年第1期。

⑥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北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6页。

⑦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294页。

⑧ 李先念:《旅游是个新兴行业,要加快发展》,见国家旅游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旅游(一九七八—二〇〇四年)》,第13页。

⑨ 《中国旅游大事记》编辑部编:《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第28页。

⑩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2分册,2004年11月编印,第212页。

⑪ 《积极发展我国旅游事业 又有十个省腾出高级宾馆、别墅接待旅游客人》,《人民日报》1979年4月28日。

除利用自有资金修建饭店外,此时中央领导层也逐渐形成了利用外资修建旅游饭店的共识。1978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时首次提出利用外资建造饭店。此时西方发达国家也急于向中国输出过剩资本,“围绕着巨大的中国市场,日美欧展开了不分胜负的竞赛”<sup>①</sup>,争相在中国投资修建旅游饭店。

尽管如此,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一是要突破社会上对利用外资的疑惧观念,二是要对合作项目进行鉴别,看是否“不吃亏”。前者需要勇气,后者需要外贸相关的专业能力。对此,邓小平指出,旅游业要任用“有闯劲、有干劲、有办法的人”。<sup>②</sup>1978年11月,原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被任命为国家旅游局局长。<sup>③</sup>卢绪章曾先后任中国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拥有丰富的外贸外汇事务经验及广泛的海外关系,任命他为国家旅游局局长,本身就体现出党中央对旅游创汇寄予厚望。

与此同时,国务院为加强领导,专门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陈慕华、廖承志牵头的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侨外资办”),负责洽谈引进侨资、外资修建饭店事务,卢绪章兼任该办公室主任。<sup>④</sup>

卢绪章上任后,凭借丰富经验和人脉迅速打开工作局面。1979年,首批中外合资饭店项目获国务院批准,包括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以及广州白天鹅宾馆、南京金陵饭店等6座,共约5000多间客房。<sup>⑤</sup>同时,侨外资办还与澳大利亚华侨经营的大城公司签订合同,进口总额为2500万美元的预制建材,由澳方监督施工,组成可以迅速投入使用的拼装式饭店。<sup>⑥</sup>

这些合资饭店有的由中方向外国银行贷款修建,逐年偿还本息;有的则是由外方出资修建,双方商定一定的股份分成,共同经营数年后,饭店所有权归还中方,建国饭店属后一种情况。国务院曾在批示中明确支持修建建国饭店:“经反复研究,我们认为合作方式与条件较好,造价低,工期短,拆迁与市政配套问题较少。……这是我与外资合作建造和经营的第一个旅游饭店,可以作为试点,创造点经验,请各有关部门积极给予支持配合,争取尽快动工,明年建成。”<sup>⑦</sup>尽管如此,饭店施工仍遭遇“让外国人在中国赚钱,主权到哪里去了”等非议,附近居民阻拦取闹,甚至把水泥搅拌机也推翻了。面对这些质疑,卢绪章顶住压力,向中央说明情况,在中央的支持下,建国饭店顺利完成施工,于1982年开业。<sup>⑧</sup>

由国家旅游局直接管理的第一家旅游饭店——兆龙饭店,也是由卢绪章一手促成的。该饭店由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有世界船王之称的包玉刚捐赠1000万美元修建。<sup>⑨</sup>卢绪章与包玉刚不仅是表亲,同时也是交情甚笃的老朋友。20世纪40年代卢绪章任广大华行总经理时,包玉刚任衡阳工矿银行经理,彼此业务往来密切。1979年,卢绪章上任国家旅游局局长不久,就积极联系包玉刚。同年10月,他们在香港会面后,包玉刚决定捐资修建饭店,以他父亲的名字“兆龙”命名。<sup>⑩</sup>兆龙饭店于1981年动工,1985年开业,邓小平亲自出席开业典礼并题写店名,肯定包玉刚为祖国建设做出的贡献。<sup>⑪</sup>通过国家拨款新建扩建饭店、挖潜以及引进侨资、外资等多种手段,旅游饭店数量迅速增长,从1978年的137座,床位3万余张,增至1984年的505座,床位17万余张。(详见表1)。

① 生井俊重:《中国经济的实态》,见丁海峰编:《中国见闻》(1),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

② 邓小平:《旅游业要变成综合性的行业》,见国家旅游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旅游(一九七八—二〇〇四年)》,第5页。

③ 《中国旅游大事记》编辑部编:《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第22页。

④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42-43页。

⑤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42-43页。

⑥ James P. Sterba. "China's crash hotel program." *New York Times*. Feb 07, 1979.

⑦ 《中国旅游大事记》编辑部编:《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第26页。

⑧ 李征:《卢绪章传》,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416页。

⑨ 《中国旅游大事记》编辑部编:《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第37页。

⑩ 李征:《卢绪章传》,第420-423页。

⑪ 徐心华:《北京兆龙饭店举行落成典礼 邓小平等同志出席》,《人民日报》1985年10月26日。

表1 1978—1984年中国旅游饭店发展情况表

年份	饭店(座)	客房(间)	床位(张)
1978	137	15539	30704
1979	150	17149	34021
1980	203	31788	76192
1981	296	43251	101084
1982	362	51625	122696
1983	371	59588	141627
1984	505	76994	171888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302页。

尽管饭店数量显著增加,但很快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使新建饭店不能完全转化为对外接待能力。首先,各地刮起到旅游区“开会”之风。据《人民日报》报道,1981年在苏州召开全国性会议73次,参加者数万人,其中旅游旺季召开的会议占75%,最长的会期达半个月,最大的一次会议参加者多达700人。<sup>①</sup>一位回国华侨也注意到该现象,认为中国旅游业问题不仅在于饭店数量少,还在于饭店承担太多会议接待任务,例如许多到广州东方宾馆开会的人明明家住广州,“为什么不可以晚上住家里,白天到会场开会呢?”<sup>②</sup>其次,以广大群众为主体的国内旅游也逐渐自发兴起,1980年仅杭州一地就到访中外游客2000万人,其中大部分为国内游客。<sup>③</sup>这些开会、旅游的干部群众使原本接待外宾都紧张的旅游饭店变得更加紧张,旅游区也更加拥挤。

为缓解饭店接待压力并优先实现创汇目标,1981年10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规定:“由于目前交通、食宿、游览点等条件较差,暂不宜提倡发展国内旅游。”<sup>④</sup>实际就是优先发展国际旅游。1982年1月,鉴于“开会”旅游之风仍在蔓延,国务院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到著名风景游览胜地开会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在旅游旺季(4月至11月)不要到桂林、杭州、苏州等旅游城市开会;各单位要建立严格的出差报销制度;接待外国游客比较集中的城市的饭店,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旅游旺季接受安排会议任务。<sup>⑤</sup>通知下发后,《人民日报》也登载了一些导向明确的群众来信,如“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过去靠的是书本。如今,随着电视、电影的普及,可以说,‘人们不出门,便可看世界’了”<sup>⑥</sup>,意在劝阻旅游之风。这些措施是在旅游设施不足的情况下为优先实现旅游创汇战略而制定的。1984年以后,随着旅游饭店数量继续增加,旅游设施有了明显改善,国家开始鼓励国内旅游。

除住宿之外,外国游客难以适应的另一问题是景区缺乏现代卫生设施。因此,在大力修建饭店的同时,国家旅游局亦积极推动景区厕所改建。继卢绪章担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韩克华,上任伊始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为此多次前往颐和园等著名景点实地考察。1982年6月,国家旅游局召开“关于重点城市的旅游点、风景区厕所建设问题的会议”,制定了公共厕所建筑标准和卫生管理规定,提出三年内解决旅游风景区厕所改善修建工作。<sup>⑦</sup>这次会后,国家旅游局拨款458万元在主要旅游景点修建了167座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厕所<sup>⑧</sup>,使主要旅游景点的卫生设施基本达到国际标准。

① 张惠明、方继忠:《“天堂”会议何其多》,《人民日报》1982年3月27日。

② 《香港〈七十年代〉文章(杂谈中国旅游事业)》,《参考消息》1978年6月7日。

③ 郁政:《应该重视国内旅游的管理》,《人民日报》1981年3月2日。

④ 《国务院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7页。

⑤ 《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到著名风景游览胜地开会的通知》(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年第2期。

⑥ 魏远安:《愿多在银屏幕前旅游》,《人民日报》1982年4月3日。

⑦ 《中国旅游大事记》编辑部编:《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第41—42页。

⑧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179—180页。

### 三、提高旅游创汇效益

进行旅游创汇实践,除改善住宿和卫生设施等旅游基础设施之外,还需设法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国家为此采取了多种措施。这些措施归根到底是要转变对旅游业性质的认识,即从以前“宣传自己、了解别人”的民间外交转变为创造经济效益的国家经济部门。这一转变自然不是朝夕之功,在本文所探讨的1978至1984年,只是初步尝试阶段。

#### 1.调整游览内容

旅游业发展目标既然确立为经济创汇,来华参观者的身份就从“外宾”变为“游客”,游览内容也须进行调整,以投游客所好。此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观名胜古迹或自然风光被视为资产阶级游山玩水的活动。外宾来华参观,一般安排他们参观大寨、大庆、林县红旗渠、儿童歌舞团,看样板戏等等。<sup>①</sup>这在当时来华外宾的文字及影像资料中均有体现。<sup>②</sup>海外人士对此见仁见智,一位澳大利亚旅游经理认为这种游览项目耳目一新:

到中国访问的人都会发觉,在中国参观的一些项目,如医院、学校、公社、工厂等,都是到世界其他各地游览时所没有的。游客到其他地方游览的节目多是参观名胜古迹、风景区或逛百货公司而已。由此可见,中国愿意将她的社会里的各个方面的发展和现况,让世界人民知道,以期收到互相交流、沟通和促进友谊之效。<sup>③</sup>

但也有不少外国游客对此缺乏兴趣。《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游记写道:“我们在上海的第二个早晨,被安排参观景泰蓝工厂。此前我们已经去过陶瓷厂和广州的船厂以及上海的地毯厂。我再也不想去参观工厂了。”<sup>④</sup>这篇游记的作者随后溜出旅游团,独自去了上海豫园。到北京后,该游客继续离队来到景山公园,看到了中国日常的一面。需要指出的是,整个70年代,北京和上海的游览内容各有侧重。在北京,外国游客除参观工厂、幼儿园等新中国景观外,也参观故宫、长城、明十三陵等名胜古迹,后者被作为封建社会的生活形态进行展览。在上海,游客则仅被安排参观工厂、少年宫等当代景观。<sup>⑤</sup>一位携子参观上海少年宫的美国游客抱怨道:“许多成年的美国游客对孩子们表演的歌舞和乒乓球感到疲倦。”<sup>⑥</sup>

改革开放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游览内容逐渐变为更受一般外国游客欢迎的风景名胜。198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建委《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级政府保护文物古迹,侵占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机构应当逐渐迁出,为古迹的下一步开放做了准备。<sup>⑦</sup>1982年,慕田峪长城经修复后开放,游客登览长城从此不必集中于八达岭一地。<sup>⑧</sup>1984年,颐和园在原有开放景点之外,修复、增开德和园、四大部洲等景点。<sup>⑨</sup>此外,新增了一些基于中国独特自然风光的旅游项目,如长江三峡的江航旅游等<sup>⑩</sup>,满足了外国游客对异域风情的向往。

#### 2.将市场思维引入价格管理

旅游创汇的前提是合理的旅游价格。旅游价格太低,不但国家亏损,旅游从业者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反之,旅游价格太高,则会吓跑游客,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创汇。因此,要实现旅游创汇,就必须引入市

① 杨公素:《回忆“文革”时期的旅游外交》,《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3期。

② 例如,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和比利时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均在1972年受邀来华拍摄纪录片,他们各自完成的纪录片《中国》和《愚公移山》(12集)的主要参观内容就是工厂、人民公社和幼儿园等。

③ 《港报文章〈为什么访华客愈来愈多〉》,《参考消息》1977年5月26日。

④ Carol Lawson. “Doing a china tour your way.” *New York Times*. May 04, 1980.

⑤ 《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到中国旅游情况》,《参考消息》1979年9月9日。

⑥ Craig R. Whitney. “Taking the kids on a china tour.” *New York Times*. Jun 29, 1980.

⑦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179页。

⑧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189-190页。

⑨ 颐和园管理处编:《颐和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⑩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224页。

场思维,根据买卖双方的供求情况确立合理的价格。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国自费游客只收取成本价,即只收取每人每天综合服务费40元人民币,其中饮食、住宿、门票、导游、市内交通费一概包括在内。长途机票和火车票另计。随着国内物价逐渐上涨,保持一成不变的综合服务费必然导致国家亏损。1979年5月,时任河北省委书记李尔重给李先念写信反映情况:“衣、食、住、行、玩,咱们都管,每个人都要赔钱,应该考虑改,我们有点‘穷大方’。”李先念将信批送包括国家旅游局在内的国务院各部门,在批语中说:“我在浙江时也听到同样反映,他们都要求改变这个包干很死的办法。因为下面的接待单位都要赔钱,招架不住。”<sup>①</sup>

1979年6月,物价总局会同国家旅游局等部门召开了涉外价格座谈会。会议认为,目前收费偏低,但涉外价格毕竟牵涉面广,国际影响大,必须慎重处理,决定保留包干制,提高包干价格(即综合服务费价格),并根据旅行团规模制定9档收费标准。<sup>②</sup>会后下发《关于调整外国自费旅行者综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于1980年1月1日开始执行。根据新的标准,对10人以上的外国团体游,每人每天的综合服务费由40元上调至65元,2至9人团每人每天90元,个人游每天130元,此外还有“经济等”“公务等”等不同价格。由于多数旅游团的规模是10~15人,因而65元是常见价格。<sup>③</sup>在综合服务费提价后,火车票也在原有价格基础上提高了75%。<sup>④</sup>对专门面向外国顾客的友谊商店,涉外价格座谈会也确定了“同质同价”“优质优价”的调价原则,即对那些在市场上敞开供应的普通商品,不论外国人买还是中国人买,一律按国内普通价格出售,对仅供外宾的高级商品则应“优质优价”,相应提高价格。<sup>⑤</sup>总之,1979—1980年涉外价格的调整宗旨是引入市场因素,依据商品价值确定商品价格,合理增加外汇收入。

这些调价措施很快引起外国媒体的注意。1978年12月底,法新社报道,友谊商店的高级呢绒第一天每米定价38元,第二天就涨为62元,古玩瓷器也纷纷涨价,语含批评。<sup>⑥</sup>《纽约时报》登载的一篇游记说,一家四口(子女年幼)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费竟花了300多美元,“乘坐飞机也只会比这略便宜一点”。<sup>⑦</sup>

从游客的角度来看,旅游费用急剧上涨确是事实。美国游客1980年来华旅游的总花费是1979年的2倍,是1974年的4倍。<sup>⑧</sup>但涨价并非仅由于中国方面调价,更多的是其他因素的影响。一是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导致国际航班价格以每月3%到5%的速度上涨。1979年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出售的美国到香港区间的来回机票价格为1000美元左右,1980年升至1600美元。<sup>⑨</sup>机票费几乎占一趟旅游总花费的1/3,机票价格的持续上涨必然导致旅游总费用的明显上涨。二是国外旅游中介公司向游客收取高额中介费,抬高了行程总价格。当时中国在国外尚未设立自己的旅游机构,将旅华名额分给几家外国公司,再由他们转手卖给具体组团的旅行社,有时转手两三次,每转一次手,价格就抬高一次。<sup>⑩</sup>这样,游客付出的费用自然很高,但利润却主要被外国中介所赚。以1979年的情况来说,中国国际旅行社当时收取每人每天40元综合服务费,另加城市间交通费。同年,美国泛美航空公司提供的中国游总价从2700美元至3000美元不等(取决于从美国西海岸出发还是从纽约出发),在华游览9至10天。<sup>⑪</sup>假设

①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6卷,第41页。

② 《关于涉外价格座谈会情况的报告》,见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编:《物价文件选编(1979—1983)》,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965—966页。

③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关于接待外国自费旅行团(者)拨款办法》,见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编:《物价文件选编(1979—1983)》,第977—982页。

④ 《国务院对提高外宾、华侨和港澳同胞火车票问题的批复》,见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编:《物价文件选编(1979—1983)》,第964页。

⑤ 《关于涉外价格座谈会情况的报告》,见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编:《物价文件选编(1979—1983)》,第966—967页。

⑥ 《法新社报道我提高对外国人的收费标准》,《参考消息》1979年1月4日。

⑦ Craig R. Whitney. "Taking the kids on a china tour." *New York Times*. Jun 29, 1980.

⑧ Paul Grimes. "China trip costs take a great leap." *New York Times*. Feb 24, 1980.

⑨ Paul Grimes. "China trip costs take a great leap." *New York Times*. Feb 24, 1980.

⑩ 吕式萍:《旅游收费要合理》,《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4日。

⑪ Paul Grimes. "China, 1979: The ways and means." *New York Times*. Feb 04, 1979.

游客在华游览10天,则中国方面仅收取400元(约260美元)综合服务费及若干国内交通费,仅占2700~3000美元总价的很小一部分。对此,英国《卫报》评价道:

美国旅游业代理人目前从每人每次旅行上赚取五百到二百五十英镑。这笔利润相当于为期不到三个星期的旅行费用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剩下来的钱中,三分之一是飞机票钱和中途逗留时的费用,另有三分之一用于中国旅游局。如果中国人真想搞旅游业,他们就应明智地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开设他们自己的旅游办事处,不让那些贪婪的经纪人从中牟利。<sup>①</sup>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国游客所感知到的高昂的旅游价格,主要是由于国内外物价的自然上涨——中国国内物价上涨和国际石油价格上升导致的机票涨价,以及国外旅游中介的分利所致。中国旅游管理部门的调价是在国内外物价上升的情况下,引入市场思维合理调整的结果。否则,旅游业非但不能为国家创汇,还将导致国家亏损。随着接下来国内物价的继续上升以及旅游设施的提升,例如,许多地方安装了空调从而增加了接待成本,新一轮提价又势在必行。1983年,国家依据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相应提高了综合服务费。北京仍然是旅游价格最高的城市,10人以上的团体游每人每天综合服务费增至87元,2至9人的旅游团每人每天106元,个人游每天168元,比1980年的价格上调了20~30%。<sup>②</sup>其他城市也相应提高了价格。

### 3. 开发销售旅游纪念品

开发销售旅游纪念品是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的常见手段。外国游客万里迢迢来华旅游,除却即时的游览参观外,也希望购买纪念品作为长久留念,并分赠亲友。但改革开放初期,旅游纪念品的生产销售较为落后。当时对外国游客出售纪念品的渠道共有三种,一是友谊商店,二是外轮供应公司,三是工艺美术服务部。前两种渠道由商业部领导,工艺美术服务部由轻工业部领导。三种渠道所售商品均是从外贸出口的轻工业产品中挤出一部分而来。<sup>③</sup>随着1978年以后大批外国游客的到来,纪念品匮乏的问题逐渐突出。例如,“外国游客兴冲冲游罢万里长城的八达岭,想买一点精致的纪念品,没有。外国游客在桂林饱赏秀色可餐的山光水色后,想买一套彩色精印的风景照片,也没有”<sup>④</sup>。有的游客只好捡块长城的石头作为纪念。<sup>⑤</sup>

1978年2月,负责旅游纪念品生产和销售的轻工业部和仅负责销售的商务部、外交部联合起草《关于搞好旅游纪念品工艺品生产和销售的报告》。报告提出,在生产上,国家每年拨款400万元用于建设原料基地,1978年拨300万美元外汇用于进口原材料;在产品设计上,要充分反映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在销售上,工商双方密切配合,扩大销售网点。<sup>⑥</sup>该报告得到国务院批准。随后,北京、上海两大旅游城市在销售网点上进行了工商的分工协作,即轻工业部负责在旅游景点建立销售点,商业部负责在涉外饭店建立销售点。到1978年底,工业部门在全国设点122个,商业部门设点70个,园林部门设点65个。<sup>⑦</sup>

1978年至1979年,根据旅游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国家进一步出台了关于旅游纪念品生产和销售的系列措施。首先,在生产方面,决定:(1)扩大短线产品的生产能力,如北京景泰蓝、广东彩瓷、杭州织锦、四大名绣、安徽宣纸等;(2)提高产品的包装装潢水平。当时70%的纪念品没有包装装潢,只用纸

① 《英〈卫报〉文章:〈贿赂现已在中国出现〉》,《参考消息》1979年5月11日。

②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关于调整一九八三年外国自费旅行者综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见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编:《物价文件选编(1979—1983)》,第1039—1040页。

③ 轻工业部等:《关于搞好旅游业纪念品工艺品生产和销售的报告》,见国家旅游局综合业务司编:《旅游商品工作文件选编》,中国旅游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④ 《香港〈快报〉评论文章:〈中共办旅游的外行手法〉》,《参考消息》1978年6月23日。

⑤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377页。

⑥ 轻工业部等:《关于搞好旅游业纪念品工艺品生产和销售的报告》,见国家旅游局综合业务司编:《旅游商品工作文件选编》,第5—6页。

⑦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378—379页。

包绳子捆,外宾既不便携带,也不适合送人。不但外宾不满,而且好产品卖不出好价。<sup>①</sup> 诚如一位从事旅游业的华侨所说:“生财之道,也就是服务之道。你为旅行者服务,为他设想,他花了钱还要感谢你;你没有服务的思想,不让他花钱,他还要怪你哩!”<sup>②</sup> 此后,轻工业部决定在已有的彩印厂基础上扩建为8到9个包装装潢厂。<sup>③</sup> 其次,在销售方面,规定一切有对外接待任务的饭店、机场都要设立友谊商店的网点,新建的涉外饭店一律要把友谊商店的使用面积计算在内。<sup>④</sup> 这一规定于1979年4月公布后,各涉外饭店纷纷在大堂建起了销售点。以北京饭店为例,以往摆设沙发的宽敞的休息区被改装成土特产出售处,出售玉石和象牙制品以及中国刺绣等,饭店大堂两侧的角落则出售中国特产蜂王精等营养药品,甚至张贴世界各国时差表的隅角也设点出售地毯。<sup>⑤</sup>

为进一步提高创汇效益,从1980年4月开始,中国实行外汇兑换券制度,即外国游客和华侨在华消费不能直接使用人民币或外国货币,必须先在中国银行将外币兑换为外汇券,再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涉外饭店等指定地点消费,以最大程度地将外汇集中到国家手中,服务于现代化建设。<sup>⑥</sup>

但这一时期的旅游纪念品开发销售毕竟缺乏经验,也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创汇目标过于迫切,在经营上集中于高档高价纪念品,没有考虑到一些外国中低阶层游客及华侨的消费需求。例如当时大力推出的景泰蓝、玉雕、珠宝产品就超出了一般游客的购买力,且体积较大,不易携带。《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封海外读者来信颇能反映这一情况,言某美国游客自忖来华一趟颇为不易,行前开列一份包括同事、邻居、亲戚在内的赠礼名单。假如购买景泰蓝等高级纪念品,以她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完成赠礼名单:

以经济收入分等,她们都属于中产阶级。她们心目中的纪念品,可能是一个咖啡杯,上面印有中国著名的风景图案;一块手帕;一件佛像的复制品;一面三角旗;一本介绍北京风光的画册等。单价不贵,生动而吸引人。……这些商品,制作容易,脱手快,积少成多,客人也无肉痛之感。<sup>⑦</sup>

表2 1979—1984年旅游外汇结构表

年份 \ 百分比	旅游外汇	购物	餐饮	住宿	交通	其他消费
1979	100%	34%	11%	13%	23%	19%
1980	100%	36%	10%	12%	22%	20%
1981	100%	38%	14%	11%	16%	21%
1982	100%	38%	13%	14%	17%	18%
1983	100%	37%	12%	14%	20%	17%
1984	100%	39%	11%	19%	16%	15%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大事记》编辑部编:《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第204页。

这些“文创产品”在国外旅游界颇为常见,成本低,利润高,但其时中国尚处于旅游业的早期摸索阶段,还没有掌握这种盈利模式。即便如此,中国旅游业毕竟迈出了寻求经济效益的第一步。通过不断探

① 轻工业部:《关于发展旅游业纪念品工艺品生产和销售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见国家旅游局综合业务司编:《旅游商品工作文件选编》,第12页。

② 丛林中:《风景这边独好——三位关心中国旅游事业的朋友访北戴河》,《人民日报》1979年4月14日。

③ 轻工业部:《关于发展旅游业纪念品工艺品生产和销售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见国家旅游局综合业务司编:《旅游商品工作文件选编》,第12页。

④ 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办好友谊商店的若干意见》,见国家旅游局综合业务司编:《旅游商品工作文件选编》,第16页。

⑤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中国用各种办法获取外汇〉》,《参考消息》1979年4月13日。

⑥ 《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暂行管理办法》(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0年第3期。

⑦ 江南:《旅游者的烦恼》,《人民日报》1981年1月3日。

索、不断改进,从1979年至1984年,旅游纪念品创造的外汇收入一直占旅游总创汇额的30%至40%之间,并且呈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由表2可见,1979年旅游纪念品(即“购物”项)占旅游总创汇的34%,1984年则上升到39%,初步改变了旅游业仅靠食宿进行盈利的单一创收模式,拓展了多种盈利通道,带动了旅游业经济效益的整体提高。

#### 四、旅游创汇的成效与影响

1978年10月9日,邓小平对民航总局、国家旅游局负责人提出:“一个旅行者花费一千美元,一年接待一千万旅行者,就可以赚一百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五十亿美元。要力争本世纪末达到这个创汇目标。”<sup>①</sup>此后,国家旅游局一直将20世纪末创汇100亿美元作为旅游事业的长期目标。在此目标下,又制定了到1985年创汇12至13亿美元的阶段性目标。<sup>②</sup>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诚如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预见的那样,旅游项目“不要看得太容易,有大量工作要做”<sup>③</sup>,这就包括改善旅游设施、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等一系列围绕“如何创汇”而展开的实践举措。

此外,中国毕竟缺乏从经济角度办旅游的经验,旅游业本身也还未从“宣传自己、了解别人”的外事角色中彻底解放出来,因此存在一些影响创汇效果的制约因素。一是经营较为粗放,如高级饭店初期依赖外国管理人员和进口设备(从建材到洗漱卫生用品均进口),造成一定的外汇流失;二是不熟悉市场运行机制,没有直接在海外设立办事处,导致外国中介公司过多参与分利,不仅抬高了游客的总花销,也直接影响了旅游创汇收益。这些问题在旅游业起步阶段在所难免,以后则随着行业逐渐成熟而规避。

表3 1978—1984年中国旅游外汇收入与外贸外汇收入统计表

年度 外汇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旅游创汇额(亿美元)	2.629	4.4927	6.1665	7.8491	8.4317	9.412	11.3134
出口外贸创汇额(亿美元)	97.4531	136.5767	182.7195	208.9275	218.1915	221.9711	244.1608
旅游创汇额对出口 外贸创汇额之比	1 : 37	1 : 30	1 : 30	1 : 27	1 : 26	1 : 24	1 : 22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大事记》编辑部编:《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第203页;《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页。

即便如此,改革开放之初的旅游业仍克服困难向前发展,取得显著的创汇成效。由表3可见,1978年,旅游创汇总额为2.629亿美元,到1984年,增长为11.313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7.5%。如果将旅游业与国家外汇的最主要来源——出口外贸进行比较,或许能更好地看出旅游创汇的成效。1978年,全国出口外贸创汇97亿美元,1984年增至24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6.5%,明显低于旅游创汇27.5%的年增长率。若将二者在各年度的比例做一纵向考察则发现,1978年旅游创汇对出口外贸创汇之比为1:37,此后差距逐年变小,至1984年变为1:22,说明旅游创汇在整个国家外汇事业中愈发重要。1985年,旅游创汇总额继续上升,达12.5亿美元,顺利实现了到1985年创汇12~13亿美元的阶段性目标。1996年,旅游创汇102亿美元,提前4年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世纪末创汇百亿美元的长期目标。<sup>④</sup>

① 邓小平:《要大力发展民航、旅游业》,见国家旅游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旅游(一九七八—二〇〇四年)》,第2页。

②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46页。

③ 陈云:《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见国家旅游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旅游(一九七八—二〇〇四年)》,第3页。

④ 施明慎:《我国旅游业实现历史性跨越去年创汇突破100亿美元 李鹏钱其琛分别题词祝贺》,《人民日报》1997年2月17日。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的旅游事业是在国家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外汇引进技术设备、同时自有外汇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作为创汇手段受到国家重视而发展起来的。理解此一时期中央对旅游业前所未有的重视,离不开“创汇”这一关键词。旅游业也确实以其“创汇”实绩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外汇资金,为平衡国家外汇收支做出了重要贡献。借由“为国创汇”的初始动力,旅游业也进行了关于自身行业建设和发展的若干探索,如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探索多元盈利模式、引入市场思维等,从而更深地融入到了国民经济整体之中。改革开放初期旅游创汇的历史实践折射出中国旅游现代化的艰难启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上的重要一页。

## A Study of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 from Tourism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LIU Ji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initial phas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significant foreign exchange was require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ourism emerged as a key avenue for generating foreign exchange and received robust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Between 1978 and 1984, the state allocated funds, attracte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xploited untapped potential to expand tourism infrastructure, particularly in the realm of hotels. Economic benefits from tourism were enhanced through reforms in tourism offerings, setting reasonable price structure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sale of tourist souvenirs. These initiatives not only facilitated the influx of substantial foreign exchange into China but also laid a firm groundwork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tself and paved the way for future large-scale tourism endeavors aimed at earning foreign exchange.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tourism industry; foreign exchange

[责任编辑 王 昊]